

目 录

概说近代史	1
一 丧权辱国	1
二 望眼世界	15
三 勃兴太平	23
四 火烧圆明园	37
五 天国悲歌	49
六 船与大炮	63
七 “富国之梦”	72
八 海陆烽火	81
九 “不败而败”	93
十 中日较量	104
十一 “瓜分狂潮”	117
十二 上书变法	126
十三 百日维新	138

十四	血沃中华	149
十五	革命勃兴	163
十六	“拒俄”、“反美”	174
十七	同盟建立	184
十八	浩气长存	195
十九	武昌起义	208
二十	民国诞生	218
二十一	“二次革命”	226
二十二	帝制丑剧	235
二十三	黑暗时代	249
二十四	“二位先生”	255
二十五	洋文化东传	263
附 录		273

概说近代史

从 14 世纪到 18 世纪,欧洲大陆上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天然而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座历史界碑,标志着人类文明告别了农业时代的漫漫长夜,步入了工业时代,揭开了近代历史的序幕。

而在同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使中国失去了通过社会自身发展演进,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机会。19 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东来,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轰”出中世纪,步履维艰地踱入近代社会。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在这近 80 余年的时间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时期,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864 年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

1840 年 6 月,英国资产阶级为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并企图借机打开中国大门,悍然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看,这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进程中,清政府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技术落后,加之长期闭关锁国,对外夜郎自大、愚昧无知,很快宣告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丧失了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自主权、司法主权等国家主权,从此,中国被套上了半殖民地的枷锁,一步一步地走向沉沦。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疯狂

狂地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从而使遭受西方冲击最严重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挑战,一部分爱国封建士大夫首先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警醒,睁开睡眼看世界,起而探究现实敏感的社会问题,思图振救。涌现了魏源、林则徐、姚莹、包世臣等代表性人物,他们要求抵抗侵略,提倡经世致用,探究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之先河。

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鸦片大量输入到疮痍满目的中国,外国侵略者企图以此麻醉中国人民,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但结果恰恰相反,鸦片这种麻醉剂却唤醒了昏睡已久的中国百姓。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10年,在中国南部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起义虽然仍旧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但它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提出了历代农民战争所未提出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资政新篇》。同时承担了反封建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任务,是19世纪中叶亚洲反抗殖民侵略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革命运动。只是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使太平天国运动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不可能制定一个明确的始终贯彻的革命纲领。同时,由于领导集团腐化堕落,争权夺利,最终酿成天京事变的大祸,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1864年宣告最后失败。

就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烈火燃遍大江南北之际,以英、法为代表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为摆脱严重的对华贸易危机,进一步控制清政府,打开中国大门,以“亚罗号事件”和“西林事件”为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历史上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余年时间里,并未吸取教训,图谋富强,因而,在反侵略战争中遭受了更为惨重的失败,圆明园的被焚、《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黑龙

江流域大片领土的丧失,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第二时期,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到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形成的时期。

从60年代到90年代,大约30余年的时间,是中国近代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此段时间内,人民革命运动相对低落,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冲突也有所缓解,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部分封建官僚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认识到引进西洋军事装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一些封建官僚开始认识到空前的世界变局,认为继续闭关锁国已不可能,应当讲述自强之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抵御外国经济军事侵略。于是,产生了以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在“求强”的口号下,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等洋务军事工业;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局等洋务民用工业;又以防范日本侵略为目标,建立了新式海军,加强了国防力量。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既要清王朝免于灭亡于农民起义,也要免于被外国列强吞并,始终有着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来军事、经济侵略的双重目的,只是随着国内矛盾的变化面有所侧重。洋务派把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中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66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和1874年广东继昌隆缫丝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近代工业的诞生。这些民族资本近代企业虽然投资少、规模小、设备技术落后、资金短缺,而且多从轻工业开始,但它却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武,改交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物质力量。

就在地主阶级洋务派大力举办“洋务新政”之时,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急于向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中

国边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日本联合美国侵略台湾，英国企图从缅甸侵入云南边境，沙俄则张开血盆大口鲸吞我国西部大片领土，法国则早就梦想通过越南侵入中国西南地区。到19世纪80年代，这场严重的边疆危机达到高潮，爆发了中法战争。此时的清军由于洋务运动而实力大增，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等一系列胜利，但因清政府畏敌如虎，对外妥协，使得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妥协条约，结果，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了。在这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值得称道的有左宗棠、曾纪泽、冯子材三人。左宗棠的功绩是率军西征，收复了新疆失地；曾纪泽是出使俄国，虎口夺食，为祖国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冯子材则是中国西南门户——镇南关万分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大败法军的民族英雄。

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完成，中国的边疆危机非但没有减轻，相反却更加严重了。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制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目标指向了中国。1894年夏，终于爆发了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堪称是决定中日两国20世纪命运的大决战。其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是中国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进行的黄海海战。战斗中，北洋水师官兵作战勇敢，涌现了刘步蟾、林永升、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但因北洋水师在舰队装备、训练、弹药等方面均不敌日军，使日军控制了制海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导致战争失败。

甲午战败的直接恶果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战争的惨败唤醒了中国人数千年之大梦，这主要表现在：以辽东和台湾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代表，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把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想发展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立“兴中会”，发动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广州起义。这三条线索标

志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甲午战后,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活跃时代,他们愤于严重的民族危机,提出一系列变法图强的政治纲领,并企图通过光绪帝这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实现变法的成功。从纵的角度看,维新运动始于公车上书,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整个运动持续向前发展;从横的角度看,维新派变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手段:上书皇帝、争取支持;办报刊,扩大影响,争取官僚的同情与支持;组织学会;兴办学堂,培养变法骨干力量。同时,维新派还鼓噪呐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思想解放狂潮。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变法历史观,为变法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则以其“常带感情”之笔,传播变法思想,阐述了民权思想。严复则翻译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引进了进化论思想,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

维新派的变法维新活动触犯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维新与守旧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戊戌政变。维新志士非亡即逃,导演了戊戌喋血这悲壮的一幕。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了,但世纪末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伴随着列强侵华瓜分狂潮,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秩序严重破坏,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失业破产,造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19世纪下半叶以来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到世纪末叶终于汇成了一股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不畏强暴,以血肉之躯向外国强盗的坚船利炮正面宣战,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英雄气概。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在于,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不久,被封建顽固派操纵利用,倒进了盲目排外的泥潭,最终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式农民战争的最后终结。

八国联军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也成为俯首帖耳的“洋人朝廷”。

第三时期，从 1901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 1912 年辛亥革命失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由发动、成功，到失败的历史过程。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而拉开序幕的。1894 年，在甲午战争的炮火声中，孙中山率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举起了革命大旗，踏上了漫长艰辛的革命征程。20 世纪初，随着留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新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终于在 1905 年成立了革命政党——同盟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走向高潮。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在思想战线上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驳倒了其反对革命的谬说；另一方面，则发动革命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统治。清王朝为了维持其统治，在 20 世纪初年先后进行了“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企图以此强化统治机器，度过难关，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自己的覆灭准备了条件。

1911 年武昌起义的爆发，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从历史上看，这次起义决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周密策划而兴起的。武昌起义的胜利给清政府以致命的一击。但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使革命力量大受损失，而富有社会经验的立宪派、旧官僚在巨大的社会变动面前，显示了极强的灵活性，他们从反对共和到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眼疾手快地抢夺胜利果实。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大敌，是革命的主要破坏者，革命党人害怕帝国主义武力干涉，而急于与袁世凯谋求妥协。帝国主义、立宪派、官僚支持袁世凯，终于逼迫资产阶级革命派妥协，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使革命走向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却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

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四时期,从1912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是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

辛亥革命不是中外反动派靠武力血腥镇压失败的,而是革命派和袁世凯相互妥协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在国内要求民主的气氛还很强烈的情况下,袁世凯不能一下子撕掉共和假面具,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一时还保留在政权中,掌握部分力量,幻想与北洋军阀合作,巩固共和制度,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组织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革命党人咄咄逼人的议会政治活动使袁世凯惊恐万状,最终引发了宋教仁被暗杀的案件及善后大借款案及“二次革命”的爆发。“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巩固共和,反对专制的正义之战,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但因革命力量弱小,最后宣告失败。从此,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镇压了革命党人之后,袁世凯建立了军阀独裁专制政权,随后又野心膨胀,阴谋恢复封建帝制,结果激起了护国运动。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人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蔡锷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最终使袁世凯的皇帝梦仅在83天便宣告彻底破灭。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没有气馁,接连发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和护法运动,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但因其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而归于失败,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来领导革命。

在这一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新纪元,为中国革命的转交提供了必要的国际条件;在国内,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空前壮大。同时,在思想文

化领域内,以 1915 年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为标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彻底清算了封建思想在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的空前解放,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近代中国历史纵向发展的轨迹,大体表现为以上叙述的四个阶段。

此外,近代中国历史虽然时间短暂,但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其中,像魏源撰写《海国图志》、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李善兰翻译西洋算学著作、詹天佑主持设计建造京张铁路、蔡元培建立新式学堂等等,这些著名的思想大师和科学巨匠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摒弃了闭关主义,大胆摄取西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从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声光化电、书刊典籍,纷纷传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面貌。

第三,从戊戌思想启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行程中,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 丧权辱国

18 世纪下半叶,正当中国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由盛转衰、危机四伏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英伦三岛发生了一件改变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1769 年(清乾隆三十四年),徒工出身的机械师瓦特,吸收前人的经验,制成第一台改良的蒸汽机,从此,大工业有了它发展所必需的动力,这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使人类告别了封建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这股强劲的工业革命浪潮很快就席卷到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法国和美洲的美国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英国的国力最为强大,它的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它的炮舰走遍全球,为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到处进行殖民掠夺和扩张,成为资本主义侵华的急先锋。1832 年(道光十二年)2 月 26 日,一只载有七八十人的英国商船从澳门出发,悄悄地沿着中国海岸线北上。船上有一位化名胡夏米的英国人,他是广东商馆的职员,这次他率领这艘“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担负着侦察中国沿海军事情报的特殊使命。这艘船从澳门出发后,经过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前后达六个多月,才返回澳门。

在中国沿海,胡夏米指挥船员,测量了长江和黄浦江的水道,还登上了吴淞口的炮台,他发现,这里的大炮质量很差,炮弹竟然和炮口不合,兵营里清军士兵使用的刀枪多数都生了锈,实际上不过是一块铁片。事后,他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建议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法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要晚,但它们对中国也怀有强烈的野心,它们虽然一时还没有能力单独发动侵华战争,

但却跟在英国侵略者之后，充当帮凶的角色，趁火打劫。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猛发展相比较，中国这个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开始成为落伍者，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咄咄逼人的挑战，必须迅速由弱变强，才能摆脱严重的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可遗憾的是，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清政府，没有意识到世界形势的这一巨大变化，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实行闭关政策。

1751年（乾隆十六年），一位荷兰商人乘坐小船将一位外国妇女带到广州，住在洋行里。很快被广州官员发现，他们认为外国妇女在衣着服饰和生活方式上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别，让她们进入广州有伤风化，立即命令荷兰商人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在这之后，清政府又颁布了一些限制外国商人在中国行动的规条，如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不得任意外出闲逛，只能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里，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等。这些防范和限制外国人行动的规条是闭关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

另外，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还下令外商来华贸易，只能来广州一个口岸，关闭了其他口岸。同时，外国商人只能与清政府特别批准经营对外贸易的组织——十三行做生意。广州十三行并不总是13家，最多时曾经达到26家，最少时只有4家，但人们一般都叫它十三行。十三行不仅负责经营进出口贸易，而且还代表清政府对外国商人进行约束管理，向外商收税。当时，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都由十三行中的某一个商号接待，外国商船的大班（船长）可以上岸住进商行里，其余人员只能住在船上，不准上岸，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由行商代替办理，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才被打破。

这种闭关政策作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曾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由于清朝统治阶级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夜郎自大，盲目排斥西方先进文化，因而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尽管清政府采取了这种控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可是，在鸦片战争前，中外之间的贸易却一直在迅速发展。当时，英国急需中

国的生丝和茶叶，从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社会开展了禁酒运动，在很多社交场合，人们纷纷以茶代酒，招待客人时也都献上一杯茶，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这样，从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到 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 70 多年间，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增加了 5 倍半以上。

而当时西方国家能够向中国提供的商品，为数则很有限。英国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金属包装制品和少量的印度棉花。这些商品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经常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这样，不少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船上装载的货物不多，太量带来的倒是银元，有一次，几艘英国商船来广州做生意，抛出了 8 万西班牙银元，购买了大量中国货，却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这样在鸦片战争前正常的中外贸易中，外国商人手里的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这在国际贸易上一般称作“出超”，这对所在的国家是十分有利的。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每年把大量的白银送往中国，为了获得最高额的利润，便不顾一切人间羞耻，向中国走私杀人的毒药——鸦片。

鸦片是从罂粟的汁液中提炼而成的，俗称大烟，是一种含有大量吗啡和尼古丁的毒品。吸鸦片烟的人，一吸上就会上瘾，如果一旦不吸，就如得重病，浑身瘫软，路也走不动，更不要说干活了。时间长了，就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一样，直至最后死亡。许多吸食鸦片的人，最后都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最后暴尸街头，惨不忍睹，因此，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对鸦片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

最初，鸦片是作为一种治病的药材运进中国的，数量很少。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占领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后，便制定了鸦片侵华政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他们把罂粟的蒸晒和鸦片制作调制到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箱子里，运往中国，很多鸦片贩子大发横财。被称为“铁头老鼠”的英国人查顿就是其中臭名昭著的人物。

查顿本来是个英国无赖，他在英国生活不下去了，被迫在

1802年(嘉庆七年)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当外科医生。为了改变自己一贫如洗的现状,查顿做起了鸦片走私的生意,他和另一个鸦片贩子马地臣合伙向中国贩卖鸦片,他的鸦片走私公司拥有许多鸦片走私船,其中“红色海盗”号是当时最有名的一艘鸦片走私船,它载运量大,航行速度快,一般的走私船每次只能装运鸦片500箱,它则可装运800箱,别的船从印度开到中国需要3个月,它只需要40天。通过鸦片走私,这个两手空空的无赖,竟然成为腰缠百万英镑的富翁,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崇拜的“英雄人物”。

鸦片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吸鸦片烟的多达200万人,在内地十几个省份都有烟馆存在,起初到烟馆吸食鸦片的是些过糜烂生活的贵族、官僚和富人家的子弟,后来发展到清军的兵丁和市井百姓,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烟民队伍。当时一个叫俞蛟的士大夫曾描述鸦片吸食者犯了瘾时的痛苦情景:“那些人烟瘾犯了的时候,眼泪鼻涕一齐流了下来,手脚也抽成一团,就是把钢刀架在脖子上,也甘愿伏在地上受死,不能挪动半步。”严重毒害了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当时有人形容中国的国势是:“野有游民,国无劲旅”,大意是说:社会上大多是游手好闲的烟民,国家的军队也被鸦片烟腐蚀得失去了战斗力。

鸦片的大量输入还使中国每年要流出大量白银,造成国内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二者之间有一个比价,一般情况是每两银子换制钱1000文,由于白银外流,到1832年(道光十二年),一两白银换制钱1350文,6年后一两白银换制钱1600多文。制钱一再贬值,负担都转嫁到了人民的头上,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国库空虚,封建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

道光帝旻宁是清朝在中国建立统治后的第六位皇帝,他没有康熙、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办事优柔寡断,对于清王朝统治面临的内外危机,他束手无策,拿不出果断的解决办法来。当鸦片输入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灾难性的恶果后,道光帝不断接到

一些大臣递上来的奏折，强烈要求禁烟。

1838年(道光十八年)6月2日，一位叫黄爵滋的大臣上奏道光帝说：“白银外流，是因为鸦片走私严重，鸦片走私严重，是因为吸食鸦片的人太多，要想禁绝鸦片烟，必须重治吸食。要限期一年戒烟，过期仍然吸食的，平民处以死刑，官员加等治罪。”这是鸦片烟流入中国近百年来最彻底的禁烟主张，他第一次提出以死刑重治吸食者的主张，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道光帝看了黄爵滋的主张，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就黄爵滋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过了几个月，各省督抚陆续复奏28份奏折，其中，湖广总督林则徐等8份奏折赞成黄爵滋的主张，给道光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785年(乾隆五十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塾师家庭里。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走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官，飞黄腾达。

青年时代的林则徐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非常刻苦，20岁时便考中了举人。此时，他除了读四书五经外，还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非常崇拜，探讨经世致用的学问。26岁时，林则徐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后来又担任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等官职。这时候，鸦片毒雾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严重地蔓延开来。林则徐认为如果对毒品听之任之，国家一定会被弄得民穷财尽，前途不堪设想，在湖广总督任内，他就严厉禁烟，并赞成黄爵滋的重治吸食的主张，在奏折中，他大声呼吁：“如果再在鸦片问题上漫不经心，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严禁，那么，数十年后，中原将没有可以用来反抗侵略的军队，也没有充足的粮食作军饷了。”这段话表现了林则徐要求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难的爱国心情。

道光帝看到林则徐的奏折，不由出了一身冷汗，他觉得要保住清朝江山，军队和粮饷两者缺一不可，想到这里他不由地提起

朱笔,在“银荒兵弱”几句话下面,一连打了好几个红圈,表示完全同意林则徐的看法。此时,他已下决心召林则徐进京,让他担负起查禁鸦片的重任。

11月下旬,林则徐从武昌起程进京,12月26日抵达北京。从第二天起,在八天之内接连被道光帝召见了八次,受到在紫禁城内骑马和乘肩舆(轿)的赏赐,这说明道光帝对他的器重。在第五次召见时,道光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严厉禁烟。

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8日,林则徐冒着风雪,毅然从北京出发,踏上南下广东禁烟的漫漫征途。为表示禁烟决心,他在途中就发出分批捉拿61名重要烟贩的命令,命广州官员执行。

3月10日,广州天字码头热闹非凡,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官员,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林则徐的到来,林则徐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了码头,他的面部表情非常严肃,人们由此似乎可以看出他禁烟的坚定决心。

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林则徐命令随从人员不得随便外出,不得走漏消息,自己会同邓廷桢、关天培研究禁烟策略。经过明查暗访,他迅速掌握了鸦片走私、烟馆开设和英国船只贩运鸦片等情报。到广州的第八天,他突然发出了一系列禁烟通告:

(1)勒令外国鸦片贩子,在三天之内,务必将鸦片全部缴出。

(2)要求外国商人写出保证书,声明今后来华的外国商船,永远不再夹带鸦片,如果带来,一经查出,立即没收充公,经营鸦片者要处以死刑。

(3)向中外宣告:“鸦片一天没有禁绝,本大臣就一天也不回去,绝对坚持到最后,绝没有随意中断的道理。”表明了誓死禁烟的决心。

外国鸦片贩子接到迅速呈缴鸦片的命令后,个个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但他们心存侥幸,以为只要躲避一下风声,就能蒙混

过关。三天过去了，缴烟的最后期限已到，外国鸦片贩子见林则徐禁烟决心坚定，被迫交出 1037 箱鸦片，妄图敷衍了事。但林则徐早已了解到有 22 艘鸦片趸船（一种平底匣形的不能自己航行的船，用来作为鸦片走私的中转站）停泊在伶仃洋面，约有 20000 多箱鸦片。现在三天期限已经过去，外国鸦片贩子仍然胆敢在钦差大臣面前耍花招。非常气愤，立即发出传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命令，颠地胆战心惊，拒绝出面。

这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怒气冲冲地从澳门赶到广州商馆，怂恿烟贩们不要缴鸦片，当天夜里，他还带着被通缉的颠地，企图一齐逃跑，被商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狠狠打击义律破坏禁烟的行动，林则徐当即下令：将停泊在广州黄埔的外国商船上的货物暂时查封，停止贸易往来，商馆里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员全部撤离。义律和一些鸦片贩子被封锁在商馆内，有些人连饭都吃不到嘴，狼狈不堪。义律见形势不妙，又耍了一个阴谋，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出鸦片烟，并声明全部烟价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这就把中国政府处理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辩，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就这样，一艘艘停泊在广州附近海面的趸船被迫开到口岸，缴出 20000 多箱鸦片（其中有美国鸦片贩子的 1540 箱），禁烟运动终于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对收缴来的鸦片，怎么销毁呢？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在两湖销毁毒品，是先在鸦片内拌入桐油，然后放火焚烧。结果，焚烧后部分鸦片渗入地下，一些鸦片贩子等到烧完完毕，偷偷挖出泥土，再煎熬一次，还可以从中提取出相当数量的鸦片。为了彻底销毁鸦片，林则徐派人去广州各地访问老百姓，终于找出了一种“煮化法”，就是在煎熬鸦片的时候，放入盐和石灰，这样，鸦片就变成了渣沫，无法再用了。他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把这批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

6 月 3 日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远近的老百姓听说今天要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纷纷赶来观看，只见海滩高处，挖了长宽各 15 丈的两个池子，池底铺